

ISSN 2186 – 3989

幸田露伴译《国译忠义水浒传》中宋江人物形象的变异

慕 小萌、卢 冬丽

The Variation of the Character Image of Song Jiang in *The National
Translation of Zhongyi Water Margin* Translated by Koda Rohan

Xiaomeng Mu and Dongli Lu

北 陸 大 学 紀 要
第56号(2024年3月)抜刷

幸田露伴译《国译忠义水浒传》中宋江人物形象的变异

慕 小萌*、卢 冬丽**

The Variation of the Character Image of Song Jiang in *The National Translation of Zhongyi Water Margin* Translated by Koda Rohan

Xiaomeng Mu* and Dongli Lu**

Received November 13, 2023

Accepted December 25, 2023

Abstract

Through translator's variation, reader's interpretation and social adaptation, Koda Rohan's translation of *The National Translation of Zhongyi Water Margin* is localized in Japan and integrated into the Japanese exotic ecology. Based on the academic standard and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the translator focuses on constructing Song Jiang's "righteousness" in the main-text and para-text, and applies this image of Song Jiang to his own historical novels. Thus, the image of Song Jiang is shaped by translators, interpreted by readers and reborn in Japan, which further reconstructs the character image of Song Jiang who is chivalrous and righteous and solidifies this character image in Japan. The traditional values in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including loyalty to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 and the pursuit of justice are inherited and transformed in the localized translation of Japan, and ultimately feed back the original literary culture, which then derives the integrated ideas and values of China and Japan, forming a broader level of cultural symbols based on the overall perspective of Asia.

Key Words : Koda Rohan, The National translation of the Zhongyi Water Margin
Song Jiang, Image, Mutation

* 南京農業大学外国語学院修士三回生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 Nanji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 北陸大学国際交流センター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enter, Hokuriku University

南京農業大学外国語学院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責任著者 卢 冬丽 Dongli Lu d-lu@hokuriku-u.ac.jp

引言

《水浒传》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海外有着悠久的翻译历史。不同社会、不同语境下不同译者构建了特色鲜明的译本，在海外阐述中国民间故事，构建中国人物形象。《水浒传》的海外译介与传播在助推中外文学文化交流、海外通俗文学成长与发展的同时，有力促进了中外文学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众多个性鲜明的英雄人物形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魂魄，译者对人物形象的解读鲜明反映出译者及其所处时代的价值取向。

《水浒传》在日本的有着悠久的译介历史，形式多样，规模庞大。据笔者统计，自江户时期《水浒传》东传日本，历经两百余年的译介生成，目前日本已有 22 本译作和诸多翻案、影视、戏剧作品。其中，幸田露伴的《国译忠义水浒传》颇负盛名，极具代表性。该译本打破传统模式，在保留汉字原文魅力的基础上增添大量反映中国社会风貌和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口语注释，是第一部真正为不谙中国文化的日本读者搭建桥梁的经典译作。幸田露伴自幼时起便深受中日古典文学熏陶，博学多才又文笔雄浑，早年便深受东方古典文学氛围和庄老佛学思想的影响，反抗权威对思想的钳制，追求顺应自然。作为卓越的汉学家、日本明治时期的文学巨匠，与尾崎红叶、坪内逍遙、森鸥外等人齐名，开创出日本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红露”时代。不仅如此，幸田露伴（以下简称“幸田”）秉承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超乎常人的前沿性，醉心于《水浒传》等中国典籍及其日译研究，抨击明治时代盛行的欧化风潮，强调文学应具有东方精神和色彩，是推动《水浒传》在日本广为流传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幸田译本通过具体人物形象的解读、翻译与形象再现，对《水浒传》中的“忠义礼赞”精神进行阐释，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受众的接受，对后世日本通俗文学的改编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1. 先行研究

1.1 《水浒传》典籍日译的先行研究

中国典籍外译在海外构筑中国文学形象，讲述中国故事，对于“体现中国精神、展示丰富多彩的中国形象大有裨益，近年来在国内外学界掀起研究热潮”（王克明，2021：10）。学界一直关注《红楼梦》在海外的译介研究（冯全功，2018；宋丹，2022）和《三国演义》中的译介路径与人物形象构建研究（许多，2017，2022）。纵观学界历年来《水浒传》的外译研究，已经有不少学者从诸多角度对典籍外译展开讨论，形成了系列研究成果。日译研究方面，中日学者整体概述了《水浒传》不同时期各译本在海外的译介、流传与影响。赵莹（2018）从江户、明治、大正到昭和时期，按照翻译史梳理《水浒传》在日本译介生成的各阶段的主要译本，认为《水浒传》的翻译热潮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减退，各时期的优秀译本是《水浒传》在日本传播的强大助推剂。日本学者小松謙（2016）则从接受层面论证了不同历史时期《水浒传》日译本对日本文学、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在个案研究方面，除了传统文本层面翻译策略研究之外，还有基于译者主体性对《水浒传》中人物整体形象塑造的研究（佐高春音，2017）和个别人物鲁智深的形象再现（许世林，2021）等。整体而言，当前针对典籍外译中人物形象塑造的研究虽然集中在英语界，但无论是研究视角还是研究方法均可以为《水浒传》日译研究提供参照。

1.2 宋江人物形象的先行研究

《水浒传》是我国著名的歌颂农民起义的侠义传奇小说，以“替天行道”、“全忠仗义”的中心思想成功塑造了 108 位个性鲜明、形态各异的英雄豪杰。其中，贯穿全书的“忠义”深刻反映了社会的黑暗与不公，为后世所称道。而作为“忠义”的集大成者和《水浒传》的核心领导人物，纵观学界历年来的研究，对宋江形象的剖析可谓百家争鸣、众说纷纭，呈现出多元化、全方位的特点，对其形象中的“忠义”这一特征尤为瞩目。

明代思想家李卓吾在《读〈忠义水浒传〉序》中提出“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忠义之烈也。”（王猛，2012：9）20 世纪 80 年代，欧恢章提出忠义形象说，认为“施耐庵既刻画了宋江‘忠’的一面，又赋予了他‘义’的性格特征。‘忠’与‘义’相互交织，其忠君和孝亲的本质是‘忠于封建的纲常和法度’。而‘义’在宋江身上最显著的表现是浓厚的‘利他精神’，‘这种大公无私的奉献正是宋江享誉天下、名垂青史、为江湖好汉所爱戴的重要原因’（欧恢章，1987：40）。20 世纪 90 年代，袁行霈（1999：20）曾评论宋江道，“作为小说中的第一个主角，就是忠义的化身。他的性格在既矛盾又统一的忠义的主导下曲折地发展”。李晶（2010：52）也将宋江一生的性格核心定为“忠义”。同样，日本学者也对宋江的“忠义”颇有关切。日本东洋史学巨擘之一的宫崎市定（1980）曾发文『宋江：歴史と小説の羅生門』，以怀疑、批判的态度，借史料分析，考证《水浒传》中“忠义”宋江形象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此外，高島俊男（2015：45）在『「水浒传」と日本人』指出，“宋江が君主に忠実で国を愛したのは、江戸時代に天皇や幕府に忠誠を尽くすことを最高の美德としたのと似ている（笔者译：宋江的忠君爱国与江戸时期的日本视忠于天皇和幕府为最高美德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此可见，自古至今中日学界对宋江形象体现出的“忠义”这一品格争论不休、见仁见智，但是鲜少有关于富含“中国元素”的英雄人物形象在海外的变异，尚没有学者从变异学、形象学的视角来考察人物形象在翻译中的形象变异。而《水浒传》中宋江的“忠义”是北宋时期低层小吏性格、生活、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时至今日，需要从历史文化的新视角来重新审视“忠义”的价值观与内涵，及其在域外的变异重生。

2. 变异学与形象学的研究视角

变异学聚焦于当今世界学术界研究的差异性问题，以同源性文学为基础，对“同”进行延伸和发展，探究异质性，是跨文明文化、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2005 年，曹顺庆正式在《比较文学学》中提出比较文学变异学，认为比较文学应该从“求同”的思维中走出来，从“变异”的角度出发，拓宽比较文学的研究。（曹顺庆、彭茂轩，2021：279）文学中的“变异”是两种文明沟通碰撞的结果，会使外来文明在异国土地上呈现出新的面貌，甚至还会使异国土传统文得以变异。其主张的“和而不同”有利于在尊重差异性、保持文化个性的同时进行平等对话，在变异中认识文明互鉴的规律。而变异所触及的一大领域就是文学在海外传播中人物形象、国家形象等形象层面的变异与重构。自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卡雷和基亚提出要注重文学在表现异国形象时的传播和构建作用后，形象学逐步受到重视。形象学认为形象兼具“自我”与“他者”的双面性，是基于文化认同度对“他者形象”进行“自我书写”的社会总体想象物，根本上是不同民族间“想象的相互诠释”，富有总体性和综合性。（宋毅菲、贾涵、孙玉卓，2022：88）形象的多元复杂性也会使不同时期的“制作者”为“他者形象”赋予独特的时代气息。形象学研究的目的是探究一个民族对“他者”的各种诠释，并考察“异国形象”在民族文化中产生

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机制及其复杂表现。

在中国文学走出的背景下，变异学与形象学的交融，即形象变异为中国文学的域外传播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野。比较文学范畴下的变异学、形象学都注重探讨文明文化的对比与变异，从“求同”到“求异”这种思维模式的转变是“是经济全球化、世界格局多极化背景下各民族文学文化重焕生机的必然趋势，有利于摆脱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学屏障的束缚，促进异质文学的交流互动，重构世界文学观念。”（曹顺庆，2011：06）近年来，变异学和形象学被应用至中国文学外译研究领域，形象变异与意义重构的相关研究越发得以凸显（陈文慧，2023；何英、雷佳娣，2022）。值得注意的是，典籍外译中的形象变异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与所处时间性（时代背景、社会思潮、民族文化心理）、中外关系、译者主体性（包括译者性格、教育背景、经历等）、读者接受有着诸多关联。而意义重构又关涉典籍在海外的接受与传播层面，海外受众对异国文学作出一般的舆论反响，对文本进行过滤、误读、移植、改造，“反映出本民族文学文化的实质特点和内在规律，从而更清晰地认知“自我”，确认中国形象的身份坐标。”（毛君仪，2022：24）翻译作为一种中介性的文学活动，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借助翻译手段对原作中的“异国形象”进行归化与异化，进而又经历读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完成对形象的变异，重构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其中的变异与重构的具体特征、路径及其影响值得深入探讨。幸田露伴译本与其他日译本相比，研究时间长达三十余年，富含深厚的汉学底蕴并关注到中国学者胡适的见解，是作为翻译家、汉学家和学者于一身的幸田露伴观点的集中输出。在精准巧妙地翻译之外，还附有“解题”、“注释”等大量的评论分析，堪称水浒观的集大成之作。因此，本文选取《水浒传》极具代表性的幸田露伴译本——《国译忠义水浒传》，运用变异学、形象学和接受学，从时代背景、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多维度出发，分析宋江人物形象在海外译本中的变异与重构，探究中国传统民族精神在日本的选择性吸收及本土化演变历程，进而阐明中日融合共生的价值观所形成的独特亚洲文学共同体。

3. 幸田译本中宋江形象的变异与重构

谢天振指出，“作者在从事其文学创作时，心目中总有其特定的对象的，而且其自信其作品能被他的对象所理解。但是经过了文学翻译家的再创造，他的作品被披上另一种文化的外衣，被介绍给出乎他意料之外的阅读对象，而这些对象既不是与他处在同一个文化背景之中，有时候甚至还不处于同一个历史时代，于是作品的变形也就在这样的接受中发生了。”（江帆，2021：119）典籍外译中的形象变异与重构往往发生在两个层面，一是译者翻译层面的，二是读者接受层面。无论译者还是读者层面，均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思潮下发生，产生中外文学的交融与互纳。

3.1 译者的人物形象变异与重构

3.1.1 副文本的宋江形象

幸田笔下的宋江人物形象变异可以从正文本和副文本两个层面加以分析。副文本的形象构建又可分为内副文本的宋江形象、学术视野的宋江形象和历史小说创作的形象延续三个方面。

首先，借助译著内副文本重构宋江侠肝义胆的正面形象。幸田在译本中肯定宋江“忠义”的同时，着重塑造宋江的“义士”形象。在《国译忠义水浒传》的开篇，译者撰写了长达42页的长篇“解题”。这里的“解题”可以理解为升级版的译者序，作为译著最重要的内副文本之一，

是译者话语的集中展示。幸田在这一译者主导的内副文本中，基于学者本位，集中概述了日本学界对宋史的记载与考证，阐述了译者对金圣叹和李卓吾等人评论的见解，可以称得上是幸田历年来“水浒观”的评论精华。金圣叹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凭借对《水浒传》、《西厢记》等著作的点评，在日本学界享有盛誉。金圣叹曾评价宋江“并非忠义，实质是光鲜华丽的外表下暗藏奸猾之心。”（欧阳远萍，2018：27）对此，幸田在“解题”中特别提出：

“^{そうかう}宋江が^{ちうぎ}忠義誠実、^{ひと}人の口耳に^{つた}傳えらるるに^いあらずば、^{いかん}如何ぞ^{ため}に^{べう}廟を立て^{せい}牲を^{そな}備へん。然らば^{しか}則ち^{すなは}宋江の^{ひと}人となり^し知るべし。宋江^{そうかう}忠義誠実^{ちうぎ}慷慨^{せいじつかう}淋漓^{がいりん}の^り状を^{じやう}記する^き水滸^{すいこん}傳七十回より^{くわい}後、^{のち}其毒を^{そのどく}仰ぎ^{あふ}死を^し甘んずるに至る^{あまた}の事、^{いた}豈當時^{こと}の水滸^{あにたう}傳に^じ存せずして、^{する}民人^{こん}これを^{よるこ}悦ぶ^あの^{せいたん}こと有らんや。聖嘆^{げんげん}が^{くく}言言句句、^{そうかう}宋江を^{へんせき}貶斥して^{かん}奸となし^き詐と^な為し、^ふ不忠不義^{ちうふ}となし、^{くわい}七十回^ご後を^{あくきつ}悪札^{ぶん}愚文、^{しん}真にあらずと^な為すもの、もとより^そ其の^{えうれい}勘戾^き詭激、^し強ひて^い異を立て^た私^{わたくし}を^な為せる^{あと}の^{おほ}跡、^{おほ}掩はんと^{あた}して^{おほ}掩ふ^{あた}能はざるものありといふべし。”（笔者译：若宋江忠心耿耿的品性没有口耳相传的话，他又为何要立庙随时为朝廷准备牺牲？由此可知宋江的为人。宋江忠义诚实、慷慨洒脱，至于水浒传七十回之后，他甘愿服毒身亡等事迹，在当时的水浒传中未曾记载、是为娱乐百姓而生的情节。圣叹口口声声贬斥宋江为奸诈小人、不忠不义之士，视七十回之后为恶札愚文、非真之物，那原本就是他执拗偏激，强行凭一己之见标新立异，来掩饰自己无能的表现。）（幸田露伴，1923：6）

幸田有理有据、尖锐地抨击了金圣叹对宋江“假忠义、真小人”的观点，鲜明阐述自身对宋江“忠义礼赞”形象的肯定与欣赏。此外，幸田将宋史中关于宋江起义的详细记载置于开篇，译者主动塑造利于读者解读的历史文本语境，加深读者对宋江起义的背景及人物形象的真实了解，为下文凸显宋江的“义士”形象增添说服力。在“解题”中，幸田分别对宋史卷二十二、宋史卷三百五十一、宋史卷三百五十三进行记录，对于“宋江率三十六人横行于齐魏、谋划起义、与官兵搏斗”的史实，幸田评价道：“^{そうかう}宋江は^{しう}三十六^{きうだい}将を^み兄弟と^ふ見なし、^ふ腐敗した^{ちうてい}朝廷に^{とも}共に^む謀反を^{ほん}起こす^お事、^{こと}真に^{しん}義理^ぎ堅く、^り勇敢で^{かた}策謀^{ゆうかん}的だ。”（笔者译：宋江将三十六名大将视为兄弟，一同向腐败的朝廷谋反，实为大义凛然、有勇有谋。）（幸田露伴，1923：9）而宋史中将宋江描述为“^{かう}京东^{とう}倭寇、^{くら}清溪^よ大盗”，对此幸田指出：“江を^{らん}盗跖^{しん}に^{ぞく}比し、^し世の^し乱臣^し賊子の^し影を^か恐れず、^お人ごと^おに^{ひと}一贊^{いっさん}を^な為る。”（笔者译：宋江不畏惧将自己比为盗贼，也不畏惧被扣上乱臣贼子的头衔，为人称赞。）（幸田露伴，1923：5）由此可知，幸田在副文本中着力抨击了中日学界认为宋江“奸猾小人、倭寇大盗”的负面形象，大篇幅地阐释宋江“忠义诚实、慷慨洒脱、大义凛然、有勇有谋”的正面人物形象，基于译者话语进行宋江的人物形象重构，引导读者的形象构建。

其次，幸田在“解题”中概述了译者自身对《水浒传》各版本的对比研究，结合其在外副文本中基于学者本位论述宋江之“义”，共同构建译者学术视野中的宋江形象。幸田在『再題

『水滸伝』(幸田露伴, 1911: 11) 一文中, 认为宋江“性命を捨着して来りて晁蓋を救うのは義理が有る。”(笔者译: 宋江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晁盖, 着实讲义气。)此外, 在『「水滸伝」雑話』一文中, 列举宋江“组织梁山泊谋反”、“得知家父病危”和“最终为朝廷甘愿服毒身亡”等典型事例, 对宋江的人物形象进行综合评价, 提出“宋江は正義を抱いてこそ、志を同じくした緑林好汉たちを組織して反抗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彼は義理堅く、親孝行をしていたが、最後は朝廷に 陥 れられて服毒死したのは残念だった。”(笔者译: 宋江心怀正义, 才会组织一帮志同道合的绿林好汉一起反抗。他为人仗义疏财、孝顺厚道, 最终被朝廷陷害导致服毒死亡, 实在有些可惜。)(幸田露伴, 1963: 07) 这一系列论述表明幸田赞扬宋江的“忠义”, 尤其是“绿林豪杰”的“义气”精神, 同时对中国古代“忠孝义”相结合的民族思想表示赞同, 对因“愚忠”导致的悲惨结局, 幸田表示出深深地惋惜与同情。

另外, 幸田通过日本历史小说的创作, 将宋江之“义”延展至其创作的文学人物形象中。『運命』(《命运》)是幸田露伴在 1919 年以明朝“靖难之役”为原型改编的史料小说, 作品中夹叙夹议、眼光独到地分析了建文帝、方孝儒、道衍等主要人物形象, 是幸田最杰出的代表历史小说之一。该书成书时间与《国译忠义水浒传》问世时间接近, 幸田在潜心研究水浒精神的基础上, 受宋江“忠义”、“侠义”气节的影响, 激发出人物形象构建的新灵感, 着重刻画了靖难之役发起者道衍的“英雄豪杰义士”形象。据史实记载, 僧人道衍不顾传统纲常伦理, 怂恿燕王朱棣谋反, 是犯下大不敬之罪、备受世人唾弃的奸猾之徒。然而幸田却另辟蹊径, 认为道衍是大义凛然、卓尔不群、不屈不挠的有谋之士。幸田指出: “道衍は僧たりと雖 [ルビの「いえど」は底本では「いえども」] も、灰心滅智の羅漢にあらずして、却って是好謀善算の人なり。是の如きの怪僧ありて、是何ぞ異僧なるや。”(笔者译: 道衍虽为僧侣, 却不是消沉无智之人, 反而是精通谋略策划之人。他就是如此一个怪僧、如此一个异僧。)(幸田露伴, 昭和 5 (1930 年): 81) 这一见解与幸田对《水浒传》以宋江为代表的绿林好汉之“义”的研究不谋而合, 也印证了当围剿朝廷“不忠”的行为发生时, 幸田仍然为策划者之“义气”所辩驳, 表明了当忠义难两全时幸田对“义”的坚定拥护。

3.1.2 正文本的宋江形象

时代背景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主导译者翻译基调的重要因素, 同时译者的身份和主体性会促使译者形成各自的翻译动机, 产生独具译者气质的翻译风格。上述副文本分析中, 幸田鲜明阐释了自身对宋江人物的理解, 直接决定其在正文本中对“义”的人物形象的再现与变异。具体的文本翻译中, 幸田坚持忠实原文的翻译原则, 采用训读的翻译形式, 在保留汉文原文的基础上按照日本读者阅读习惯增添注音假名, 在呈现“中国元素”传统韵味的同时尽量使文章贴近大众。此外, 幸田在译本中增译大量详实的口语注释, 尤其注重对日语中难以找到解释的中文词汇进行分析(冯雅, 2019: 13), 为不谙汉字的日本普通大众塑造出一幅气势澎湃的水浒画卷。

例 1：

原文：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郓城县宋家庄人氏。为他面黑身矮，人都唤他做黑宋江；又且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施耐庵，2000：319）

译文：那^かの押司^{あふし}、姓^{せい}は宋^{そう}、名^なは江^{かう}、表字^{へうじ}は公明^{こうめい}、排行^{はい}は第三^{だい}。祖居^{そきやうんじやうげんそう}郓城縣^か宋家村^{そんじん}の人^し氏^{かれ}、他^{かほくろ}が面黑^みく身矮^{ひく}きが為^{ため}に、人^{ひと}が都^{すべ}て他^{かれ}を喚^よんで黑宋江^{こくそうかう}と做^なす。又且^{またかつい}家に於^おて大孝^{たいかう}に、人^{ひと}と為^なり義^ぎに仗^より財^{ざい}を疎^{うと}んず、人^{ひと}皆^{みな}他^{かれ}を称^{しょう}して孝義^{かうぎ}黑三郎^{こくらう}と做^なす。（幸田露伴，1923：214）

例 1 译文有关宋江的注音假名主要涉及人名“公明”“孝義黑三郎”、地名“郓城縣宋家村”、官名“押司”等方面的文化负载词，以及人物形象“面黑く身矮き”和人物性格“大孝、義に仗り財を疎んず”的描写。训读的翻译形式最大程度保留中国典籍中的异域文化色彩，从衣食住行到礼仪，再到宋代历史生活画卷的呈现，栩栩如生还原宋江所在的宋朝面貌，同时刻画出宋江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孝顺守礼的外在人物形象。

幸田在对宋江外在人物形象的刻画格外鲜明，他在赞叹宋江“忠义礼赞”的同时也承认宋江的矛盾性，认为“替天行道”旗帜的背后仍受封建伦理的忠君思想而桎梏。因而在翻译时，秉承着否定道学、以“义”为核心的好汉人格崇拜观念和追求自由洒脱的绿林精神，通过对宋江的“义举”行为多处添加注释以及在译本开篇解题中附上“宋江起义”等史实的方法，双重显化宋江的“义士”形象。

例 2：

原文：如常散施棺材药餌，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作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施耐庵，2000：400）

译文：如常^{によじやうくわんざいやくじ}散施^{さんし}棺材药餌^{ひと}、人^{ひんく}の貧苦^{すく}を濟^{ひと}ふ、人^{きふ}の急^{すく}を調^{ひと}ひ、人^{こん}の困^{たす}を扶^{ここ}く。此^かを以^{かつ}て山東^{さんとう}河北^{かほく}に名聞^{なきこ}え、都^{すべ}て他^{かれ}を稱^{しょう}して及時雨^{きふじう}と做^なす。却^{かえつて}て他^{かれ}を把^おつて天上^{てんじやう}より下^{くだ}る^{でき}る^{きふじう}の及時雨^{いばん}と一般^よに能^{ばんぶつ}く万物^{すく}を救^ひふに比^なし做^なす。（幸田露伴，1923：365）

例 2 中，幸田采用文末注对宋江的江湖绰号“及时雨”添加注释，“必要な時に時雨なしぐれといざという時に助けてくれる人なり、次の『臨江仙』の詞はここから得たものだ”。（笔者译：在需要的时候下的雨，也指紧急关头救人于危难之中的人。下文《临江仙》中的该词就是由此而来。）由此，更加直观地刻画出其“扶危济困”的义士形象，并与后文《临江仙》中的“及时甘雨”和“山东呼保义”相呼应，在向不谙中国诗词的日本读者补充知识、开阔视野的同时，也进一步印证了宋江“山东绿林魁首”的仗义疏财人物形象。

例 3：

原文：晁盖道：“亏杀这个兄弟，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来报与我们！原来白胜已自招在济州大牢里了，供出我等七人。”（施耐庵，2000：406）

译文：晁蓋^{てうがい}道^いふ、這箇^{しゃこ}の兄弟^{けうてい}に虧殺^{きさつ}して、血海^{けつかい}也似^{また}たる干係^{かんけい}を擔^{たん}ちや^{やく}きて、來^{きた}つて我^{われ}ら

ほう よ ぐわんらいはくしょうす みずか とら せいしうだいろう り お れう われ ら にん きょうしきつ
に報興す。原 来白勝已に自 ら捉へられて濟州大牢裏に在り了し、我等七人を供 出す。

(幸田露伴, 1923 : 370-371)

在例 3 中, 译者通过晁盖对宋江的评价“血海也似たる干係を擔着して、来つて我們に報興す”, 并在文末注释为“命の危機場合をせおつて助けに来て(笔者译: 冒着生命危险来帮助我们)”, 译者在文末添加口语化注释, 达到了锁住汉字魅力和便于日本读者理解的双重效益, 强化宋江“舍己救人”的性格特点。这不仅有利于传播中国古典词汇的文化常识, 更在通晓汉字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将“血海”解释为“冒着生命危险”, 从而凸显出宋江为兄弟两肋插刀的高尚品格, 显化了其“大义翎然”的义士形象。幸田在寻求保留异域文化和考量译本可读性的平衡中, 添加补偿性的注释增译, 秉承自身对宋江“忠义礼赞”的赞扬态度, 对原文形象进行适当地筛选、调整, 最终为日本读者塑造出以“义”为核心的宋江人物形象, 实现了原文、译文、读者的跨时空对话。而且, 幸田对原文中的“忠君”思想尤其是“愚忠”, 虽不能完全苟同, 但大多遵循原文不做改动。此外, 他还着重解释宋江之“孝”, 冲击了武士道的“轻孝道”思想。由此, 跃然于纸上的忠义之士宋江变得更加生动饱满且极具说服力, 实现了由内而外双重的忠义, 也对广大读者和当时日本社会的价值观引领起到一定的作用。

3.2 读者的人物形象接受与重构

基于比较文学译介学的观点, 翻译的主体除译者本身外, 还应包括读者和接受环境。(李群, 2019: 81) 读者作为译著接受与传播的主体受众, 基于社会大众的解读也会给文本注入新的阐释, 生成新的集体意义与文学形象。幸田译《国译忠义水浒传》问世后引发强烈反响, 再度掀起了日本的水浒热, 吸引了一大批深受侠义文化撼动的忠实读者, 并衍生出翻案小说、翻译本、戏剧、绘本等一系列《水浒传》在日本的改编, 在将水浒推向高潮的同时, 也深刻影响了当时社会的风气, 进一步固化了宋江形象, 推动了中国水浒故事及“义士”精神在日本的异域重生与延续。

一方面, 宋江“义”的形象在读者群体中的固化。幸田译本出版正值明治维新时期, 日本高举文学改良的旗帜进行近代文化革新, 白话运动社会思潮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中国白话文学里程碑的《水浒传》盛极一时, 讲述市民文学、高举“替天行道”旗帜的《水浒传》与日本“反对政治腐化的幕府统治”的主流思想不谋而合。(翟嘉文, 2019: 03) 同时, 随着西化意识的觉醒, 涌现出一批能以启蒙思想这种近代日本文学的新模式来研究中国白话小说的学者。幸田正是处于这种社会大环境下, 以江户时期大量的翻案小说和普及的绘画为基础来研究《水浒传》的主题和人物形象, 其翻译的梁山好汉英勇起义等引人入胜的情节和古典韵味浓厚的艺术性语言后被极大的保留与传唱, 吸引了众多日本忠实读者。宋江之“义”的形象固化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 幸田在副文本中添加了关于宋江起义等史实根据, 注重故事的史实性, 读者在译者引导下塑造宋江之“义”的历史现场。另外, 译者在译本中还不乏添加考证, 指出水浒人物来源于评书和元杂剧, 增强了人物的真实性, 坚定了读者赞扬宋江之“义”的信念。读者对《水浒传》所反映出的“忠义”精神以及忠义的集大成者宋江都给予了高度认可, 普遍认为宋江是忠义的化身, 当时日本民众还兴起了以水浒人物绰号自称的热潮。还有, 《水浒传》中的侠义、忠义思想也延伸到了日本的刺青文化中, 原本只是将书中已有纹身的英雄人物(如浪子燕青、九纹龙史进、浪里白条张顺)绘成浮世绘, 以彰显水浒英雄的侠肝义胆。随着后世的发展, 以宋江为首的 108 位英雄好汉都被设计成拥有不同刺青的人物, 这也为充满理性精神的儒家文化与充满感性冲动的侠客文化的矛盾体——宋江形象平添一丝血性之气。浮世绘的发展也将彰显忠义侠义的刺青文化搬上了歌舞伎的舞台, 进一步在市民中显化了宋

江的“义士”形象。

另一方面，幸田译本引发日本高质量翻案小说的横空出世，在日本本地化讲述水浒故事，凸显宋江的“义士”形象。幸田译本出版之际，江户时代町人阶层兴起，代表市民文学、与日本的社会进程紧密相连的《水浒传》引发读者共鸣，也激发了读本小说的兴起和后世层出不穷的翻案小说，推动了作品的生成与发展，为文本增添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即便是进入 21 世纪，翻译热潮依然在延续。北方谦三（2005）改写的新《水浒传》，受幸田译本赞扬宋江之“义”的影响，将原著中有效忠朝廷之念的核心人物宋江刻画为一个具有超强领导力、一心打到宋王朝并建立新国家的革命色彩传奇人物，使宋江的义士形象得到进一步升华。柴田煉三郎（2011）的『柴煉水滸伝——私たちは梁山泊の好漢です』，以核心人物及其事迹为主线重新构架，讲述跌宕起伏的水滸历程。他在『水滸英雄伝風雲編』、『水滸英雄伝疾風編』、『水滸英雄伝激闘編』中按照人物分开阐述各自的故事。其中第二部『水滸英雄伝疾風編』的“宋江再編”中，在开篇中提及受幸田译本强调宋江之“义”的影响，尤其注重凸显原著中恪守“效忠朝廷”的宋江在面对“忠义难两全”之时，内心无法抑制的“义”这一情感描写，着重体现宋江之“义”。例如，原著中宋江在碌碌无为、满腔抱负意难平之时曾在浔阳楼墙壁上题写了一曲《西江月》，又在其下加了如下四句诗：“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对此柴田解释道：

“詩に出てくる黄巢は唐末期の造反首領だった。唐僖宗の時、黄巢は王仙芝と一緒に謀反し、王仙芝が失敗した後、彼は代わりに、河南、江西、福建、洛陽を奪取して長安を攻め、皇帝を蜀に追い込み、皇帝を自称し、兵が敗れた後に自殺した。宋江は酔っ払って調子に乗っていたが、黄巢も無視していた。この詩は間もなく彼に災いをもたらした。しかしこの時、彼は何も知らなかった。”（笔者译：诗中提及的黄巢是唐代末年的造反主力军。唐僖宗时，黄巢和王仙芝一同谋反，王仙芝败后，他就取而代之，攻打河南、江西、福建、夺洛阳后直逼长安，将皇帝赶入蜀中，自立为帝，兵败后自杀身亡。宋江酒醉后得意忘形，竟对黄巢也不屑一顾。没过多久，这诗就给他招致了杀身之祸。然而此时，他毫不知情。）（柴田煉三郎，2011：34）

这段解释体现了柴田在人物创作中凸显宋江内心按捺不住的“义”，使宋江的“义士”形象更加饱满具体。总之，幸田译本使《水浒传》在日本社会风靡一时，对日本的读本小说、戏剧影视、绘画文学都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其译本对宋江“义士”形象的构建起到了先导作用。在日本町人阶层崛起、大众文学普遍流行的时代背景下，日本大众读者接受并固化了宋江的“义士”形象，并在幸田译本之上不断再创作，进一步扩大了幸田译本的受众范围，实现了用日式审美情趣与价值观念延续形象变异的历程，对忠义的宋江形象进行了本土化的创作与解读。

3.3 忠义观在日本的变异

忠义思想是中日两国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是国家和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然而自古忠义难两全，在尽忠和尽义发生矛盾冲突时，两国的取舍却截然不同。中国古代的忠义观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学说基本的道德标准。“忠”指的是忠君爱国、忠于民族和人民，而“义”则是信义至上、克己奉公。（郭辉、胡丞嗣，2020：99）在君主专制统治下的旧中国，“忠”的内涵主要表现为“忠君”，即“唯君是从、效死以忠”。在《水浒传》中，尽管宋江通常被认为是忠义双全的人物，但他宁可被朝廷背弃也誓死效忠皇帝、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变“替天行道”为“顺天护国”等种种举动表明，在其传统观念里，“忠君”思想根深蒂固，远超“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的江湖义气。除《水浒传》外，中国古代的其他典籍中“忠君”

思想的重要性也可见一斑。郭沫若曾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写道：“明朝国制，误在重制科，循资格。是以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指出忠君思想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作用。此外，《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在得知旧主刘备的消息后，置曹操的锦衣玉食于不顾，义无反顾地投奔了刘备，这正是“忠于主上、不事二主”的绝佳典范。

日本对中国儒学的忠义观进行本土化的发展完善，形成独具日本民族特色的传统道德理念，在幸田所处的时期表现为义理与忠义相互交织的思想观。“义”是武士道精神中最严格的标准，要求武士必须遵循义理和道德。（于师懿，2020：124）《菊与刀》第七章“最难承担的回报”中谈到，“在日本古代传说中，道义发自内心，毫无怨恨，那是现代日本人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刘锋，2008：43）克己奉公的日本人同样奉行忠于民族国家的理念，但武士道精神要求武士忠诚于自己的集团。幸田在翻译《水浒传》中对宋江奋不顾身维护梁山泊团体的义举多有注释，凸显宋江“义”的形象（如前文提及的对“及时雨”、“血海”和性格外貌等词汇的注释）。值得注意的是，《水浒传》中歌颂的侠义之“义”与日本忠义思想之“义”有所不同，例如《忠臣藏》中，47名武士不惜切腹自尽也要为主上报仇雪恨，这是趋向于统治阶层、自上而下地为主尽忠之“义”。而中国的侠义则起源于江湖草根，是自下而上地为匡扶正义而存在之“义”。因此，侠义精神始终带有“仁”的色彩，而武士道精神所蕴含的忠义精神则是以绝对忠诚为指导之“义”，是一种强化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体现。幸田对宋江“忠义”形象的精彩刻画使水浒热进一步上升，促进了这部经典文学作品在日本不断重生，在文学以外的领域也擦出文化交融的新火花。忠义思想激发了《七龙珠》中“仁义礼智忠信孝悌”八颗灵珠的构想，同时《犬夜叉》中灵魂之玉的原型也来源于此，体现了忠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交织糅合。此后，日式忠义观形成了动态平衡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部经典动漫在中国也颇具人气，进一步深化了国人对忠义的思考和对日本民族精神内核的理解。另外，在水浒热愈演愈烈的过程中，大量的水浒漫画也横空出世。日本漫画家横山光辉在1967-1971年间创作的《水浒传》漫画中将梁山泊首领宋江塑造为武功高强、手持利刃的大英雄，将宋江的义士形象体现的淋漓尽致。

综上，受不同民族国家价值观和社会主流思想的影响，中日两国形成了亚洲区域不同文化土壤下独特的忠义观。幸田译本对宋江“忠义”形象的日式化解读，使作为原著国读者，即中国读者能敏锐地捕捉到译作中“中国元素”，深刻理解和定义异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异同，在文化反哺中持续完善本民族文化，永驻文化活力。中国“忠孝义”相联结的“忠义”思想启示日本人更加重视“孝”字当先，而日本由“义理”精神衍生出的强烈集团意识又加深了中国人对维护个人集团利益的认知。（孙琳，2020：66）虽然中日对忠义的阐释有所差异，但总体上呈现趋同性，在文化的交流融合中，达成了“忠孝义”精神的融会贯通。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今天，东亚地区在儒家文化圈产生的传统忠义价值观念经由历史的沉淀而不断发展新生，形成专属于东亚区域的文化气质，忠于国家民族集体、行义举、讲义理的文化内核与追求差异性的西方民主观形成互补，有利于增强世界民族认同感，以和谐信任的理念推动全球发展和进步。

3.4 总结

本文基于变异学和形象学的视角，结合译者主观能动性，考察了富含侠义忠勇精神的宋江人物形象在日本的融合与再生。幸田译《国译忠义水浒传》经由译者变异、读者解读和社会改编等，在日本本土化并融入日本异域生态。译者基于学者本位和译者主体性，在正副文本中着力构建宋江“义”的人物形象，并将宋江之“义”延展至其创作的历史小说的人物形象创造与构建。由此，宋江形象经由译者塑造、读者的解读以及水浒故事在日本的改编重生，进一步固化了变异的人物形象，重构了侠肝义胆、义薄云天的宋江人物形象。忠于国家、民

族,追求义理的忠义思想是中国经典文学映射的传统价值观在日本本土化译介中的继承与发展,并最终反哺原文学文化,进而衍生出中日合璧的思想观和价值观,形成基于亚洲整体视角的更广域层面的文化符号。

翻译以本土价值走向为基调,传递文明智慧、彰显中国魅力、实现文化互融,是翻译最根本的价值。幸田译本对宋江“忠义礼赞”形象的显化与重“义理”的形象变异,说明与儒学一脉相承的日本注重吸收中国的忠义思想,并将其糅合为独具民族特色的日式忠义。这代表着民族的选择,本质上反映出虽然两国社会背景和价值观取向有所不同,但中日同属东亚文化圈,忠义思想在根源上具有共通性,正是这种连气同根的共通使得日式“忠义”的新内涵能够反哺中国,加深中日两国的理解,也构建了生生不息的忠义思想。这种儒家忠义理念代表了整个亚洲重视民族身份认同感、追求诚信互助的文化气质,也在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中不断互补完善,是顺应文化多样性背景下世界和平发展的指导理念。聚焦译本的形象变异,对探究异域文化是如何以翻译为桥梁实现文化合璧,并成文化互融的价值观,进而促进文明交流与互鉴大有裨益,这无疑也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路径。

参考文献

- [1] 幸田露伴.国译忠义水浒传[M].印刷株式会社.1923.
- [2] 幸田露伴.再题『水浒传』[J].日本文艺丛书,1911年第39卷.
- [3] 幸田露伴.『水浒传』雑話[J].日本现代文学全集,1963年第6卷.
- [4] 幸田露伴.露伴全集[M].岩波書店.昭和5:81-82.
- [5] 小松謙.<水浒传>諸本考[J].京都府立大学学术報告委員会編,2016.12 p.55-9.
- [6] 佐高春音.『水浒传』の語りをめぐる考察:人物描寫を中心に[J].東方學/東方學會編,2013.07 p.71-88.
- [7] 柴田煉三郎.水浒英雄伝疾風編[M].南海出版社.2011.
- [8] 高島俊男.『水浒传』と日本人[M].東京:大修館書店.2015.
- [9] 宮崎市定.宋江:歴史と小説の羅生門[M].中央公論新社.2017.3p.233-235.
- [10] 曹顺庆,彭茂轩.从“学科危机”到“变异学”——中国比较文学的问题意识[J].中外文化与文论,2021(03):272-287.
- [11] 曹顺庆.变异学确立东西方比较文学合法性[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7-05(009).
- [12] 陈文慧.《诗经·国风·野有死麋》英译形象变异与重构[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23,42(01):27-33.
- [13] 冯全功.《红楼梦》中修辞认知的功能与英译评析[J].当代外语研究,2018(05):90-100.
- [14] 冯雅.《水浒传》在日本的传播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9.
- [15] 郭辉,胡丞嗣.“忠义”与“夷夏”:近代中国民族英雄记忆建构中的两种话语[J].安徽史学,2020(04):93-101.
- [16] 何英,雷佳娣.文学翻译中的形象变异与重塑——以《金陵十三钗》英译本为例[J].甘肃高师学报,2022,27(01):34-39.
- [17] 江帆.译介学研究:令人服膺的中国声音——从学科史视角重读谢天振《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论文集[J].中国比较文学,2021(04):116-129.
- [18] 李晶.浅议宋江忠义思想的表现[J].文学界,2010年第6期.
- [19] 李群.接受学视域下《深夜食堂》的吸引力影像研究[J].西部广播电视,2019(22):81-82.
- [20] 刘锋.菊与刀[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
- [21] 毛君怡.创造性叛逆视角下鲁迅在英语世界的接受[D].上海外国语大学,2022.
- [22] 欧恢章.对宋江形象的再认识[J].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02):34-41.

- [23] 欧阳远萍.近三十年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研究综述[J].菏泽学院学报, 2018,40(04):24-28.
- [24] 宋丹.林语堂英译《红楼梦》之文化历程[J].外语教学与研究,2022,54(04):611-622.
- [25] 宋毅菲,贾涵,孙玉卓.形象学视角下中国文化的西方想象——以迪士尼版《花木兰》为例[J].今古文创,2022(24):83-85+89.
- [26] 孙琳.传统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与现代重构[J].厦门广播电视大报, 2020,23(01):63-70.
- [27] 施耐庵.水浒传[M].人民出版社.2000.
- [28] 王克明.中国典籍外译的目的与策略研究[J].翻译与传播,2021(01):9-16.
- [29] 王猛.明清序跋视野中的《水浒传》接受[C]//.水浒争鸣(第十三辑).团结出版社,2012:9.
- [30] 许多.译者身份、文本选择与传播路径——关于《三国演义》英译的思考[J].中国翻译, 2017,38(05):40-45.
- [31] 许多.罗慕士《三国演义》全译本中的刘备形象建构[J].外语教学,2022,43(04):76-81.
- [32] 许世林.《水浒传》英译本中鲁智深人物形象的再现——以沙博理英译本为例[J].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21,41(01):92-93.
- [33]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四）[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34] 于师懿.儒家文化与日本武士道精神[J].西部学刊,2020(09):123-125.
- [35] 赵莹.《水浒传》日译本[J].语文学刊,2018,38(02):78-83.
- [36] 瞿嘉文.传播学视野下的江户町人艺术研究[D].东南大学,2019.